

傅筑夫对经济史学科的探索及其独特贡献^{*}

赵德馨

内容提要:傅筑夫从读大学预科时起,学习兴趣从理科转到文科中的国学、文学、哲学,再转向社会科学,在而立之年确定以中国经济史学为志业,先博而后专。他是中国最早在大学讲授经济史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也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治中国经济史,从殷商到近代;治欧洲经济史,从罗马帝国的经济到工业革命的完成,可谓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他在中西比较中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经济就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他的论著覆盖经济史学科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分支学科。他的观点自成一家。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经济史学人中是少有的。

关键词:傅筑夫 经济史学科 中国经济史 欧洲经济史

一

傅筑夫1902年9月出生于读书人家。从3岁起,祖父、父母就教他背诵《三字经》《千家诗》等启蒙读物。9至13岁念私塾,读四书、《诗经》和唐宋八大家古文,老师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学家。14岁入小学,19岁从教会中学毕业,英语能读能说。他喜爱理科课程,对化学有浓厚的兴趣。19至20岁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理化预科。20岁入本科理化系。当时许多国学大师(如鲁迅、梁启超等)都在该校讲学。这些名师的启迪,激起了他对国学的兴趣。到第二学期转入国文系,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古汉语课程,也选修了古典文学方面的课。还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随着对先秦诸子学说和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学习兴趣又从语言文学扩展到哲学。他听了著名哲学家陈大齐、傅铜等教授的课,并在他们的指导下阅读了一些哲学名著,尤其是法国柏格森和德国叔本华的书。他深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醉心艺术理论和宗教哲学,试图写一本兼论艺术与宗教的书,为此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艺术理论、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在鲁迅的建议和指导下,做了半年的中国古代神话资料的搜集工作,查阅了很多先秦文献资料。23岁(1925年下半年),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选修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读了几个重要学派的代表著作,他为了能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还学习了日文。为了探源河上肇在《经济学大纲》中介绍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从日本邮购了《资本论》英译本。接着开始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着手《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的写作。1926年从师大毕业后,先后任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学概论、经济学原理、农业经济学等课程,内容主要是西方经济学说,也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与历史的论文,使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际的研究步步深入。1930年《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际》书稿完成,约30万字,1931年由天津百城书局出版。^①这

[作者简介] 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430073,邮箱:dxzhao@zuel.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批准号:15AZD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经济史学起源和形成考察”(批准号:21B1120)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傅筑夫自述》中谓此书出版于1928年,可能是由于记忆不准确。

是傅筑夫的第一本专著。它开启了傅筑夫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之路。由于该书的立论根据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大段引征马克思的话,并提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不能在天津租界外销售。这限制了该书的影响力。

到此时为止,傅筑夫在学海中遨游,经历了从理科到文科再到社会科学之变,从唯心主义哲学到唯物主义哲学之变,从西方经济学到马克思经济学之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知识,学养渊博。他打下了坚实的古代汉语和国学基础,掌握了英文、日文(后来又学了德文)的阅读能力,知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掌握了收集与整理历史资料的方法。这为他研究中外经济史准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

30至34岁(1932年—1936年)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傅筑夫主讲中国经济史。此后便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志业。他与马哲民、陶希圣等人,是中国最早一批在大学讲授经济史学课程的教授。他们与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一起,是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

1937年至1939年,傅筑夫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先在罗宾斯(L. Robins)教授指导下研究经济理论,后在陶尼(H. Tawney)教授指导下研究欧洲经济史。至此,傅筑夫的理论修养,是既懂西方经济学,又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专业上,既懂中国经济史,又懂欧洲经济史,并深入地了解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为他以后在教学上讲授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课程、在科研上开展中西比较经济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40年到1945年7月,傅筑夫在国立编译馆主持中国古代经济史料的整理工作。因有王毓瑚教授的协助,又配备了4个助手和8名抄写员,四年多的时间里,搜集了大量资料。1947年—1985年,傅筑夫任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外经济史与《资本论》研究课程,同时进一步补充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并整理成一套分为7卷、纲目清晰的《中国经济史资料》。1978年到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由助手帮忙核对资料,1982年出版《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出版《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前后经历40多年,使他掌握了丰厚的、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成熟的、自成一家观点,一部中国古代经济通史的雏形已在胸中。从扎实的、系统的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编辑资料长编,开展专题研究,概括出历史过程,抽象出概念与理论点,是他论从史出的治学之路。

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1977年,傅筑夫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与计划研究经济史学。他先后被指派编辑《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和翻译约翰·哈罗德·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书成,出版时编者、译者不能署傅筑夫姓名,前者用的是介子编,后者用的是傅梦弼译。^①1957年到1977年,傅筑夫55岁到75岁,正是一个学者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段。

在南开大学的38年间,傅筑夫有两次被借调到外校工作。第一次,1955年—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向经济史学专业教师研究班的研究生(笔者是其中的一员)授课,主讲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主要是欧洲经济史,从罗马帝国的经济到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并为这两门课程编写了讲义。这使他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古代延伸到近代。

第二次是1978年—1985年,傅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经济学院之约借调到北京,承担全国社会科学八年规划中重点项目《中国经济通史》的撰写任务。1978年他已76岁高龄,又患严重的冠心病,出自要把研究心得贡献给经济史学科和社会的强烈愿望,也由于该院给他配了多位助手,创

^① 这是当时通行的处理方式。周秀鸾、张郁兰和笔者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的“前言”中写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是傅筑夫教授。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他和人大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的研究成果中的某些史料,谨向傅筑夫教授和人大国民经济史教研室致谢!”出版社将其中有关傅筑夫的字句全部删除。

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他奋不顾身,在6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共12种书稿,总计约420万字。^① 平均每天成稿或定稿2000字。对于一个80岁左右的老人来说,工作量如此之大,效率如此之高,令人惊讶。他因此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二

傅筑夫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论著中。^② 他的论著可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史料书,有两种:(1)《中国经济史资料》。计划是七编,已出版第一编《先秦编》和第二编《秦汉三国编》;第三编《魏晋南北朝编》,已整理好,未出版;第四编《隋唐编》和第五编《两宋编》的资料已分类,待整理;第六编《元代编》和第七编《明清编》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这种规模的中国经济史资料长编,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今天,还没有其他人做过。(2)《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

第二类是分析现实社会经济的。专著有上文提及的1931年出版的书,论文有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40年代两次当报纸主笔时写的时论。这些时论多以报纸的社论和评论形式面世。署名傅筑夫的有关论文,今天还可以收集到的有30多篇。就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而言(主要是1926年至1949年间),分析的是现实的经济问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则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的分析。

第三类是关于外国经济史的。计有:(1)教材。外国经济史讲义(打印稿)。(2)译著。《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3)论文。如《两次大战间世界经济演变之大势》。(4)访问记。如与瞿宇武教授谈关于16到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农业经济。(5)大量的体现在有关中西比较经济史的论著中。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经济史实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计划是七卷本,写成并出版了的是其中的第1—5卷,它们是傅筑夫50年来对中国经济史探索的主要结晶。此外还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打印稿)和多篇有关中国经济史实的论文。这些论著对殷商至194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西周至宋代中国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演变,做了详尽的叙述与剖析。

第五类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理论的。1956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1957年出版《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1980年代出版《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册和续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后面的两种书是他经济史理论的代表作。

第六类是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他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及方法》《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分段及其缺点》《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由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研究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国近代经济史〉序》^③等文章,以及他所作专著的绪言中,表达了对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指导理论、研究方法、学科功能及其应用、历史分期、队伍建设、有关政策的主张,还在对聂国青著《中国土地问题之史的发展》(华通书局1930年版)、马哲民编著《社会经济概论》(大东书局1931年版)、郑行巽著《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版)的评介中,具体地讨论了经济史学论著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等问题。

严中平认为傅筑夫的学识是“学贯中西,自成一家”。张汉如的评价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

① 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从1978年6月借调往北京经济学院,直到1985年初去世,6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书稿12种,其中11种已出版(下文所列史料书两编、史实书《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史论书《中国经济史论丛》三册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一本),未出版的一种,共计约420万字,平均每年65万字,除去节假日,每天(含住医院的时间)超过2000字。

② 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第146—149页,附录二“傅筑夫主要著作目录”。其中个别论著有误,也有少数遗漏。凡已列入该目录的,本文不再注释其出版、发表信息。

③ 傅筑夫:《序》,于素云、张俊华、周品威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愚以为还可以补充一句:横通经济史学科的几个主要分支学科。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经济史学家中是少有的。

三

傅筑夫在经济史学科中的多个分支学科都有突出建树,这里重点介绍他对经济史理论的贡献。傅筑夫对经济史理论的贡献,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或者说论证了一条与欧洲经济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和欧洲自古就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用现在某些学者喜爱的术语来说,“大分流”始于2000多年之前,而非后来才有的。他所论证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时间,上起殷商(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下至20世纪的前期,前后3000多年。在他研究的这3000多年中,包含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其特殊性。

傅筑夫认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就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其特色是发展很不充分;就奴隶制而言,其特色是在殷代之后的封建经济形态中残存既久远,又严重。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很不充分的标志是远没有达到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那样的水平。其原因有二:一是它产生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时期,其时尚处于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刀耕火种的“游农”阶段,不得不常常改换耕地,不能长期定居一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只能为氏族所有,奴隶也只能为氏族所有,这就限制了奴隶的使用,奴隶制不能高度发展。这是氏族制与奴隶制的混合物,是一种氏族奴隶所有制。这样一来,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与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在物质基础和奴隶所有制两个方面都不同。二是在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就因周灭殷这个特殊的政治事故而被封建制度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封建制社会经济形态中,奴隶制的遗存非常严重,几乎延续到近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奴隶制还有过几次发展,甚至是大发展。中国历史上,在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里,氏族制的遗存非常严重;在封建制社会经济形态里,奴隶制的遗存非常严重。前一种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遗存非常严重,非常久远,以致界限不清晰。这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道路的特色,也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长期难以取得共识的原因。

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是傅筑夫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点。他认为,中国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个大阶段、两种发展形态:第一阶段是从西周初年到东周前期,其发展形态是领主制经济;第二阶段是从东周后期到19世纪中叶,其发展形态是地主制经济。他称第一阶段的发展形态为典型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第二阶段为变态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如果说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是傅筑夫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点,那么,变态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便是他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重点中的重点。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中,封建社会占了2400年以上。在24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典型封建制延续的时间相当短,从西周初年开始到春秋初叶时即已逐渐崩溃,历时不到500年,比欧洲的封建社会要短500至1000年。变态的封建社会经历了1900年,占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80%。第二,变态封建社会的下限即中国近代史的上限,这个阶段的特殊性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就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形态是变态的,它不仅与中国典型的封建经济形态不同,还与欧洲的封建经济形态不同,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

傅筑夫对为什么将西周称之为典型封建社会作了如下的说明。“奴隶制度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新生产方式,必然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作了不少经典性的说明和精辟的科学论断,当然这些说明和论断,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用简单的话概

括起来,就是:当罗马的奴隶制度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必然要崩溃的时候,它不可能跳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由奴隶制度直接过渡到自由农民的租佃制度,而只能前进一步,由奴隶变为隶农,即由直接的人身隶属关系,变为隶属于主人的土地的一种间接隶属关系,隶属的关系未变,改变的只是隶属的形式。然而这一点的变化,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包含着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当奴隶变成了隶农之后,不久又随着土地占有形式的改变,即庄园制度的产生,隶农变成了农奴,从而正式揭开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帷幕。典型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又是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役地租)为主,庄园制度正是为了实现农奴制剥削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国在西周时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变化,在长达三千年左右全部封建制度的历史中,只有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是正常的,是完全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那样一种经济规律在运行的。”^①这就是说,所谓典型的封建制度,就是与欧洲封建制度相类似的制度;所谓变态的封建制度,既是相对于西周的封建制度而言的,也是相对于欧洲封建制度而言的,即与欧洲不一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

中国封建制度有哪些特色?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道路又有哪些特色?对此,可以将傅筑夫的有关论述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货币经济以及相关商品经济发展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也特别高。他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这个特点放到世界历史中加以比较,发现中国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这样一种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在欧洲则发生在15和16世纪。两者相距约2000年。傅先生的此说可称之为中国货币经济早熟论。

其二,由于货币经济以及相联的商品经济发展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特别高,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成为货币可以购买的商品的这种现象也出现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也特别高。表现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成为私有财产,这促使土地私有制和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的产生。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逐渐代替以公田制为基础的计口授田的井田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逐渐代替领主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流入生产过程,这一点在农民,特别是自耕农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其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带来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②的土地所有权两极化的现象。富者为地主,贫者为佃农。佃农因其贫穷,必然是小土地经营,即所谓小农经济。土地私有制是变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制经济则是变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核心。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与土地使用权高度分散成了地主制经济和变态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使“地主制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领主制经济,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在地主制经济的结构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具有领主制经济不能达到的残酷程度,从而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化”。^③这种绝对贫困化使部分小农或不能继续其再生产,或缩小经营规模,或弃田不耕,转徙流亡,这“是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阻力”,“是国内市场萎缩和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④“小农制经济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发展迟滞状态的一个总根源”,^⑤这个矛盾造成大量贫者因无法生存下去而聚众大起义,起义多数以改朝换代为结局。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在发展了一个时期后,由于上述矛盾造成的社会大动乱

① 傅筑夫:《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

② 《汉书》第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37页。

③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77页。

④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85、86页。

⑤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95页。

和经济的大损耗,导致经济或迟缓,或停顿,或倒退。在此之后,又来一个恢复、发展、倒退。社会周期性动乱造成经济的“发展—危机—倒退”的周期循环,使经济发展从长期、总体上看表现为停滞。

其三,由于货币经济以及相关商品经济发展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特别高,商品生产和雇工制因此出现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也特别高,表现为出现雇有大量工人的厂矿的产生。商品生产和雇工制中包含资本主义因素,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在中国经济中出现特别早。

1955年,傅筑夫在给我们这批研究生讲课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按照其发展过程,将它分为4个阶段和形态,分别使用了4个概念:(1)资本主义因素。(2)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4)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有“资本主义”4个字,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为了说明这四者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他用稻作为比喻。每一粒成熟的稻谷上都有一个胚胎(胚芽),它就好比是资本主义的因素。稻谷上的这个胚胎只有遇到适宜的条件(水分与温度),才能长出稻芽,这稻芽就好比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稻芽只有遇到适宜的条件(温度、阳光、水分、土壤、营养液等),才能长成有根有茎有叶片的稻禾(稻的植株)。这稻禾就好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块田里,稻稗共生,如若稗草多于稻禾,这块田只能叫稗田,稻禾只是田中多种植物之一,这种情况就好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国民经济中诸生产方式之一。如若稻禾多于稗草,稻禾在田中诸植物中占优势,这块田就可以叫做稻田,这就好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优势后,这种国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了,这时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在战国时期,唐宋时期出现最初的萌芽。^①19世纪中叶之后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能发展到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

其四,由于货币经济以及相关商品经济发展得特别早,达到的水平特别高,对现存社会结构与秩序的破坏力也特别大,使封建统治阶级很早就认清了商业是引起社会变化的起点,是直接间接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从而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安危存亡息息相关的。于是,抑商既是重农的需要,也是稳定统治的需要,所以创造出一整套理论和严密的经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和官工业制度。禁榷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把销售量最大和最有利的一些工商业(首先是盐、铁,后来又不断扩大)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经营。土贡制度是把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大量必需品和奢侈品,以任土作贡的方式,直接向产地索取。凡不能由贡的方式获得或得之不足的物品,由政府设立作坊或工场来自行制造。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是限制商人的营运范围,堵塞他们发财致富的道路,同时也就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始终停滞在萌芽的阶段上,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代替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得以长期延续。

1980年和1981年,《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先后问世,因其理论系统和新颖,引起国内外经济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欢迎与关注。《中国经济史论丛》1980年1月出版,当年《历史研究》第2期刊载张作耀的书评,^②可谓神速。后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日本的上智大学采用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作为讲授中国经济史的教材。《中国经济史论丛》是一本专题论文集。1980年的夏天,美国华盛顿大学委托他将该书观点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简明扼

^① 他讲课时,正好完成《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书。其中讲到唐代已现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端倪,宋代就出现资本主义因素萌芽了。

^② 张作耀:《勇于探索 不囿成说——评傅筑夫著〈中国经济史论丛〉》,《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要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目的是为了译成英文并用作教科书。《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出版后，牛力达先发表读后感，接着《经济研究》发表王成吉的文章予以赞扬。^① 1982年教育部发文将该书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到傅筑夫去世的1985年，4年间该书印刷4次。《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5卷简体字本在内地相继问世后，在香港又出版繁体字本。自1981年起至今，给予这三本书好评的文章，与之商榷的文章，绵延不断，称得上反应热烈。经济学家许涤新^②、王成吉，经济史学家严中平^③、瞿宁武^④，历史学家姜义华、武克全，^⑤哲学家张汉如^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鲁力^⑦，都认为傅筑夫的经济史理论自成体系（有的称之为理论框架），因而成一家之言（有的称之为有独特的见解）。

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中，中国经济史理论这门分支学科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这门分支学科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是近百年来众多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若说王亚南是理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史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典型之一（其代表作是1946年1月在福建永安初版的《中国经济原论》和它的修订版、1946年由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胡如雷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经济史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典型之一（其代表作是198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那么，傅筑夫便是经济史学家对中国经济史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典型之一。

四

傅筑夫之所以能在经济史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体系，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一条是他方法正确。刘啸、鲁力、牛力达、张汉如等都对傅筑夫的治学方法作过探讨，其中，张汉如最为深入。他是南开大学哲学教授，研究方向是科技哲学中人的创造性思维。他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找一个典型学者做解剖的对象，几位经济学家推荐傅筑夫。张汉如的研究成果是《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一书。所得结论是：“傅筑夫在经济史领域独树一帜，就是说他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他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经济思想，至少还有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掌握，特别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为统帅，以训练有素的古文和外文为工具，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史实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重要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例如，关于资料考证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关于‘从事实到理论’的归纳法使用问题，关于分析、综合与比较方法的使用问题，关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区别，不能用朝代划分经济史分期问题，等等。这些都凝铸了专论性成果、通史性成果、概论性成果。所有这一切，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结构，改变一点，牵动全局，这就是体系。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⑧傅筑夫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是由于他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因而思想解放，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① 牛力达：《傅筑夫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读后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王成吉：《一本有独特见解的书：读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经济研究》1983年第2期。

② 许涤新1984年6月5日祝贺傅筑夫教授执教55周年题词，又傅筑夫逝世时在所赠挽联中许涤新写道：“心潜今古，成一家言。”

③ 傅筑夫逝世时严中平所赠挽联是：“学贯中西，自成一家。”

④ “在傅筑夫的全部著作中贯穿了一个他对中国经济史的自成体系的解释”。瞿宁武：《傅筑夫传略》，《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

⑤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是“二十世纪跨代综合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的代表作之一”，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体系的见解。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386页。

⑥ “傅筑夫在经济史领域独树一帜，就是说他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第134、135页。

⑦ 傅筑夫“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理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经济史教学与研究中，傅筑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史自成体系的见解”，“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鲁力：《傅筑夫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成就述略》，《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⑧ 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第135页。

不盲从教条,不囿成说,更不苟同流俗。正如他逝世时一位学者的留言:“勤苦治学,学天下更新之学;奋力著作,作世间未有之作。”^①

Fu Zhufu's Exploration and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 History

Zhao Dexin

Abstract: During he was in the preparatory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Fu Zhufu's interest in learning shifted from sciences to Chinese studie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then to social sciences. At his thirties, he was determined to tak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s his life's work, firstly be knowledgeable and then specialized.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professors in China to teach economic history courses at universities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modern discipline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He studied both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Yin/Shang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study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may be said to be knowledgeable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aving a thorough knowledge both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e found that as early as 2,000 years ago, Chinese economy had embarked on a development pat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urope. His works covered many branch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discipline. He had established his own school in the studies of economic history. This situation was rare among the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ir generation.

Keywords: Fu Zhufu, Discipline of Economic History,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第72页。